



六四·三十年 深度

六四专访

专访前四通总裁万润南：三十年来血仍未冷，格局变化将带来新局面

海外民运30年，他不认为是成功，但也绝不认为是一场失败。海外民运被“修理”这么多年，却始终没有被“屠宰”掉，正显示其韧性之强。“至少我们血还是热的，骨头还是硬的。”

端传媒记者 雷隆 发自巴黎 | 2019-06-04



海外民运的标志性人物之一，72岁的万润南。摄：凯枫/端传媒

“我常说，人这一辈子，按平均寿命算大概三万天，我还剩下3286天。”五月下旬的一天，在巴黎郊外一间餐厅里，面对一众旧友，万润南语气平静地说。席间响起一阵低声的、善意的哄笑。

“不对，还有3276天。”万润南想了一下，改口说。笑声再度响起，但是更低沉了。他大概想起，上一次做这种计算，已经是十天之前的事了。

说这话的时候，距离六四30年纪念日只有不到两周。而这一众旧友重逢，也不是为了听这位当年的四通公司总裁掰起手指头算日子。他们从英国、德国、芬兰、澳大利亚等地汇聚而来，是为了一个已经等不到三万天的朋友——今年四月，旅居法国、常年为民运事业奔走的张健，在从泰国回法国的航班上突发急病，班机紧急降落在德国慕尼黑抢救，仍无效去世，年仅46岁。

更早之前，资深民运人士魏京生的弟弟魏小涛，于1月28日在巴黎去世，也不过65岁。万润南亲题挽联：“何去匆匆神州正破晓；此行悠悠天国听惊涛”。但事实上，魏小涛走得比张健更加无声无息，除了一个极小圈子，几乎已经被外界遗忘。

30年间，故人纷纷凋零，更显出时间的无情，以及催生出的急迫感。这在万润南身上，或许比当年广场上的学生领袖们体会更深。

2014年，万润南从美国旧金山回到法国巴黎。在旅居美国的15年里，他开过机场出租车、当过“包租公”，也试图在纳斯达克市场上掘一桶金，却没有哪项事业，能再和自己在1980年代创办的四通公司相比。更不必说，在此前后，他作为海外民运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也难以避免地卷入到这场混乱事业的恩恩怨怨之中。

颇有捉狭含义的是，在回忆八九民运的长文《我的1989》中，他评论“改革四君子”之一翁永曦，曾说人生有三大悲剧——“少年得志、中年折翅，临老入花丛”，而和政治上“少年得志”的翁永曦不同，四通如日中天之际遭遇1989，对万润南可谓“中年折翅”，如今却是不折不扣、字面意义上的“临老入花丛”——回归到巴黎远郊的一栋花园洋房里，终日以养花怡情。

72岁的万润南，身体已经大不如前，十余年来他一直受心脏病困扰，时好时坏，几年前又做过一次大手术。过度劳累和情绪起伏，正是心脏病人的大忌，然而故人的离去，又不可能不扰乱心绪。记者原本联系好的见面计划，也因为万润南操办张健的追思会“疲劳到极点”、需要绝对静养而被婉言推迟。

终于得见，“万爷”忆起往事，仍然思路清晰、颇为健谈。他习惯性地用“资产”和“负债”等商业术语，来评估六四对于中共的意义，但这位当年传奇般的商界领袖，对于曾经写在《我的1989》长文中的历史细节，已经不愿再多重复。相反，关于这场运动各方面的反思，关于“在商言商”，关于华为总裁任正非的“悲剧”，他却有更多话要说。

30年意味着什么？对于旁观者而言，不免有种一代人韶华时光逝去的伤感；但对于历史亲历者万润南而言，虽不免有类似感慨，却更多回味着中国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面对海外民运这30年，他不认为是成功，但也绝不认为是一场失败。用他的话说，海外民运被“修理”这么多年，却始终没有被“屠宰”掉，正显示其韧性之强。“至少我们血还是热的，骨头还是硬的。”

无论在与“民主中国阵线”旧部的座谈中，还是在与记者的对谈中，万润南梳理中美贸易战以来的形势发展，认为在后八九时代持续30年之后，“一个新的局面开始了”；并且，他把这种转机，寄托在美国的最终“醒悟”之上。虽然他始终低调地称“功成不必在我”，但不经意间仍然流露出来期望——或许这一次成功了呢？

端=端传媒

万=万润南



1989年4月19日，北京学生在胡耀邦的肖像前放上鲜花和花圈，以悼念这位刚去世的国家领导人。摄：Catherine Henriette/AFP/Getty Images

改革派、学生、知识分子都需要进一步反思

端：你写的《我的1989》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点是，你当年作为商界人物，在运动前半期其实一直强调四通公司的利益，认为学运局势混乱会对公司发展不利。如今生活在法国，黄马甲运动最受强调的一点，也是对商业利益的冲击。身处黄马甲的国度回看1989年运动，有哪些共同的经验教训？

万：任何类比都是跛脚的，因为场景、历史条件和时空环境都不一样。但黄马甲也好，1989年学生运动也好，本质上都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感性、情绪、冲动会压倒理性思考，主要出发点是为了表达不满，至于要求什么，有时并不是很明确。

群众运动都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感性、情绪、冲动会压倒理性思考，主要出发点是为了表达不满，至于要求什么，有时并不是很明确。

比如黄马甲运动，直接起因是增加燃油税，但根本原因是在经济地位、就业等问题上长期有不满情绪。1989年也是一样，当时改革开放十年，但是民间对收入分配非常不满，特别是胡耀邦之死也成了一个导火索。这种对改革当中所产生问题的积聚已久的不满，成了一个火药桶，一旦爆发出来，就引发了大规模群众运动。

群众运动有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目标和组织，就显得很重要。一般来说，自发性的群众运动都缺乏组织，因为所有的群众组织，比如“高自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都是在广场上临时成立的。而黄马甲的领导核心也不是很确定的团体。也就是说，这种自发性的群众运动，谁也指挥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比较激进的情绪就容易占据主流。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先静坐、然后绝食，抗争越来越激烈。但这种群众抗争能不能达到效果，关键是有没有一个有组织的、能够控制的力量，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你开一辆汽车，不能光轰油门、不踩刹车。开车要有动有停，抗争也是一样要看你的阶段性目标是什么。如果达到了，那么就可以开始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如果不断加码，最后肯定是车毁人亡。

开车要有动有停，抗争也是一样要看你的阶段性目标是什么。如果达到了，那么就可以开始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如果不断加码，最后肯定是车毁人亡。

当年波兰实现民主转型之后，我去团结工会拜访，他们很强调的一点是，团结工会当初发动格但斯克（Gdańsk）造船厂工人大罢工，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当时军政府找他们谈判，他们提出的条件得到接受后，整个罢工就基本结束了。这就是说，团结工会有能力让罢工开始，也有能力让罢工结束，于是就成为一个“可谈判”的力量。

1989年，学生也提了很多要求，比如要同政府对话，结果统战部的阎明复、教育部的何东昌、北京市委的袁立本通过不同渠道都出来对话了，而实际上参加对话的学生后来也说，这是一种“无效”的对话，什么意思呢？从对话的目的来看，当局希望学生结束抗争，当时戈尔巴乔夫要来访问，起码外宾来的时候北京能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但实际上学生做不到。即便学生代表答应了也没用，等回到广场又都被否决掉了，甚至他们自己的对话资格也被质疑。如果知识分子出面，也会被怀疑是帮当局说话。整个群体没有一个真正的指挥系统，也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力量，是凭情绪在拼。这样一个运动，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和（民运理论家）胡平曾经谈过“为什么学生运动总是以失败结束”，胡平的回答是，因为学生运动“不失败就不结束”，1989年的悲剧就是这样。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在赵紫阳主持下，当局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大让步。比如说，学生绝食以后要求对话，并且要求直播，这些都满足了，而且一段时间里新闻媒体上相当正面地报导学生运动，学生要求撤销“动乱”评价、要求承认是爱国民主运动，这些实际上也间接地承认了。

当然，这中间卡在一点，即是否能公开地撤回“四二六社论”（即《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因为社论是邓小平定的调，而李鹏姚依林等人实际上用“四二六社论”绑架了邓，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坚决反对撤回，而赵紫阳被夹在保守派和学生之间就很是为难。

当时阎明复等人和学生代表对话时已经很诚恳，几乎是流着眼泪地讲，你们要给改革派多一点时间。但最终无济于事。

端：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分野，是事后总结出来的，还是八九的历史情境中大家已经清晰认识到的？

万：当时大家就已经有明确认识。杨继绳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中将其总结为“双峰政治”。1980年代的改革，几乎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攻守，前者以邓小平为首，手下有胡耀邦和赵紫阳；后者以陈云为首，也有李鹏和姚依林两员大将。

陈云的基本思路是主张“鸟笼经济”、就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下，可以有一些自留地等小自由，但大的经济框架不能动；邓小平在经济上更加开放一点，“不争论”，基本上就是跟着美国走，但与此同时，邓又坚持“鸟笼政治”，也就是不能超越“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关键问题还是“坚持党的领导”，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地位不能动摇。

当我们说邓是改革派旗手时，指的是经济改革；而在政治上，邓和陈并没有区别。可以说，陈是“鸟笼经济”加“鸟笼政治”，邓是“自由经济”加“鸟笼政治”，而胡和赵在政治改革方面有更多想法，但他们无法主导整个局面。所以当保守派对胡赵进行攻击时，邓小平步步退却，先后放弃了这两员大将。

陈云是“鸟笼经济”加“鸟笼政治”，邓小平是“自由经济”加“鸟笼政治”，而胡耀邦和赵紫阳在政治改革方面有更多想法，但他们无法主导整个局面。

端：如何理解邓小平既有“钢铁公司”般的政治定力，又做出如此之大的放弃？他为什么不能力排众议、力保胡赵？

万：一方面，保守派攻击的是胡赵的政治问题，而这也是邓小平非常在意的。另一方面，这其中也涉及到许多政治操作上的问题。比如说，邓最后下决心放弃胡耀邦，是因为胡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对党内同僚表达了对施政遭掣肘的不满，却被告密。而邓对于挑战他最高

权威的行为历来不能容忍，例如对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魏京生等人的态度都是如此。



1989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北京会面。摄：STR/AFP/Getty Images

端：这类似于赵紫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表态。按理说，胡耀邦和赵紫阳都是党内历次残酷政治斗争和清洗之后的幸存者，应该懂得进退分寸，怎么会犯这种错误？

万：这一点上，可能还真是太高估他们了。政治人物有些是靠谋略，有些就是正派加运气。比如胡耀邦有句名言，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也不必有。另外，他的一个长处、同时也是短处，就是从不拉帮结派，所以他身边没有一个“派”。

而至于赵紫阳，他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透露邓仍然是中共最高决策者，被外界认为是事件走向的一个转折点。从实际操作角度来说，负责安排活动的人应当负一定责任。比如从六四后江泽民重用曾庆红来看，曾在政治上很成熟。而赵当时的政治秘书鲍彤在思想水平上没得说，但在党内斗争的细节安排上不够成熟老道。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把会谈用直播方式对外公布，这就成了一个问題。

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会谈，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把会谈用直播方式对外公布，这就成了一个问題。

当然，这件事也不完全是赵紫阳的问题，当时甚至“邓办”都要求赵讲一下这件事（邓小平的角色），因为之前戈尔巴乔夫和邓小平见面后，中国官方说这是中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实现会晤，但苏方说我们还没有见到中共的总书记，于是邓办就希望赵紫阳见面时能够说明一下这个情况。这些都不是问题，关键还是用直播方式捅出去了。

事后很多人都问赵紫阳为什么要这么讲，而赵的回答是没有想到会出现这种结果。这种回应，说实话不能让人满意，因为你是政治人物，怎么能对一种说法产生的政治后果事先没有想到？你必须想到啊。而且当时政府和学生已经卡在对“四二六社论”问题上，赵紫阳本身是准备在这个问题上妥协、而且说由他来承担责任的，但这样一直播，把所有的怒火和矛头都转向了邓小平，邓当然不高兴，也正是从那时起，形势才开始急转直下的。

端：针对学生缺乏组织和策略的问题，《我的1989》当中已经提出过批评。30年后的今天，是否还仍然坚持这种批评？

万：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学生第一年轻，第二还在成长过程当中，他们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不是他们本身的问题，而是共产党的长期培养教育的问题。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也是自食其果。

有很多有争议的说法，其实仔细想想，共产党一直是这么教育的。比如柴玲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期待流血”、要通过鲜血来唤起民众等等，但这种思维方式不正是共产党的教育产物吗？不怕流血、敢于牺牲、不愿妥协的政治文化，在这一代人身上体现出来。知识分子去劝说学生，被嘲讽为“你们是来摘桃子的”——好像自己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果一样——这完全是党文化、毛式语言熏陶的产物。

不怕流血、敢于牺牲、不愿妥协的政治文化，在（学生）这一代人身上体现出来。

同样，阎明复说“要给改革派时间”之后，学生方面的回应居然是“我们不被共产党的派系斗争所利用”，但最后还是不知不觉当中被利用了，而且显然是被保守派利用了，因为到后来很明显，李鹏等人就是希望学生留在广场上，这样他们才能够有镇压的借口，也让赵紫阳无法收场，如果学生真的撤了，他们下面的文章反而不好作了。

当然，今天我们主要应该谴责的，始终是掌握专政镇压工具的强者。当年我提醒王丹可能会被暴力镇压时，他认为最多不过是被棍棒打一顿，然后两个人抬一个赶出广场——他们的经验是从1976年“四五运动”里来的，学生对共产党的残酷一面缺乏足够认识。



1989年5月28日，学运中担任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的柴玲在天安门广场上发言。摄：Chip Hires/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端：但是当年柴玲表态中有争议的地方，除了刚才提到的“期待流血”，另一个就是她自己不想牺牲，你怎么看待以她为代表的学生领袖的这种想法？

万：说实话，她还真代表不了学生领袖，这很大程度是柴玲个人的特质。很明显，党不是这么教育的，而是舍生取义、流血从我开始等等。我认为这反映了柴玲本人性格上的缺陷。某种意义上讲，她（当年）还是很天真的，在这些方面，她反而讲的是真话。

端：《我的1989》当中提到你的岳父李昌先生，他当初参加过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所以对1989年的局势发展非常焦虑，担心可能酿成流血冲突。这是不是因为按照中共党史来说，“一二·九”运动是中共北平市委领导，所以这种历史经验会让后来的中共领导人认为，学生运动背后必然有“黑手”，所以必须强硬对待？

万：在这一点上，你还真说错了。“一二·九”运动本身背后就没有什么“黑手”，所谓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划，这都是后来的革命神话。

李昌先生和中共其实都非常清楚，当年这场学生运动是如何自发兴起的，并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和中共地下党毫无关系，但在后来的革命叙事中把这一段完全改写了。

后来在纪念“一二·九”运动时，当年的中共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后来的清华校长蒋南翔曾有个讲话，其中把彭真吹捧为“一二·九”运动的领导人，但彭真心里清楚，他和这场运动没有关系，所以他的反应也很有意思，对蒋南翔说，纪念大会可以口头提一下，但不要写入书面。（万润南夫人、李昌之女李玉插话：彭真1936年春天才来北京，毛泽东在同年秋天长征结束到达延安后才听说北平学生运动的事。）

正因如此，李昌先生从来没有怀疑过1989年的学生背后有阴谋策划，但对于预判这个政权面对学生运动要镇压、要流血，这一点他是有明确认识的。

端：那么在知识分子这边，你觉得最应该反思的是哪些方面？

万：他们本身有双重角色，一方面，相当部分知识分子在劝说学生离开广场，做了很多工作，但成效不大；后来刘晓波、侯德健、周舵、高新四个人绝食，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取得广场上的话语权，因为如果学生静坐绝食，知识分子上来劝，是不管用的，但如果我们和你们一起绝食，那就算共患难了，他们当初的确有这方面的想法。而且，六四凌晨最后关头从广场撤退时，他们也发挥了作用，避免了更大牺牲。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本身的最大失策，是在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谈话之后知识界的《五·一七宣言》。

另一方面，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本身的最大失策，是在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谈话之后知识界的《五·一七宣言》，指责邓小平是“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一下子把邓逼到死角。从知识分子的正直和理性角度出发，提出这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但这就是当年的政治现实，在此之前，知识分子基本扮演这踩刹车、救火的角色（虽然无效），而某种意义上说，《宣言》起到了激进作用，激化了矛盾。



1989年6月，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李鹏等在北京接见戒严部队。摄：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我不是邓，我不如邓

端：30年来，有人先是流亡海外，后来写了保证书或者悔过书换取回国资格，你在这30年中有没有这种机会？

万：此前有很多朋友出于善意，通过各种渠道问我要不要回去，至少可以看看亲人，但前提都是要表明态度，就是认错，当然也有一些婉转的说法，让我起码要表示一点“内疚”，我当时的回应是，第一，到这个岁数，现在违心的话不想再说了；第二，杀人的人不内疚，我这个反对杀人的人反倒要内疚，这是什么道理？

杀人的人不内疚，我这个反对杀人的人反倒要内疚，这是什么道理？

2010年我的岳父李昌去世的时候，中纪委派人问家人，李老还有什么遗愿需要配合解决，我的岳母很直接地说，李老的愿望就是“让小万回来”，这个事情当然中纪委自己做不了主，所以给中央办公厅打报告请示，同时因为担心我在海外的言论影响这件事的运作，还特意向我打招呼，不让我“乱讲话”。中办本身只是个办事机构，最终还要主管领导人拍板，当时主管政法安全系统的是周永康。最后中办正式给中纪委回函，说“有关部门”不同意。

我当时很清楚，肯定是不同意的；而且即便同意了，也要履行很多手续，都是我没法接受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朋友做过努力，找过贾春旺、俞正声、曾庆红、胡锦涛等人，甚至连“保证书”都帮我写好，最后都是因为我不肯“有所表现”，所以就算了。

端：但不管在政界还是在商界，“能屈能伸”应该都是一项美德，何况你如果回到国内，影响力或许会比留在海外大得多。

万：十几年前就有朋友专门去美国劝过我，说邓小平“三起三落”，还保证过“永不翻案”，最后不也成功翻案？你就低低头嘛。我说我不是邓小平。朋友为此还很不满，因为很多工作都已经铺垫好了，只等我点头就好。

但此话怎讲？我的意思不是说我比邓小平更有骨气、更讲人格。我是说我“不如”邓小平。邓是何许人也？在井冈山时期就是毛派，在中共领导人体系中曾是第三号人物，1966年文革打倒“刘邓司令部”的时候，邓心里很清楚，他和刘不是一路人，被打倒是给林彪让路。而邓是什么时候给毛写“永不翻案”的保证的？是林彪在温都尔汗摔死以后，邓知道自己有机会了。而我在共产党里有这种地位、作用和机会吗？如果中国真的面临民主转型了，我写个悔过书也就写了，但是没有这种机会，我学他写“永不翻案”，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如果中国真的面临民主转型了，我写个悔过书也就写了，但是没有这种机会，我学邓小平写“永不翻案”，这不是自取其辱吗？

端：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六四之后30年无法平反，但等李鹏和江泽民等一拨人退出舞台，六四有可能得到平反吗？还是说中共的体制惯性，导致即便人事不再，制度也依然会维持很久？

万：我个人的一个估计，是这件事有可能的。对于共产党来说，不应该再把六四看成是一笔负债，而是一笔资产。因为当你要动员民众时，重新评价六四其实是一个成本最低的办法。邓小平不是喜欢打桥牌嘛，六四就是一张牌，如果打得好，是有利于动员民众、得到支持的。

至于当局有没有可能去做？从我得到的一些说法来看，确实有人在考虑这件事。每当六四来临是，有些人就被警告或者安排强制旅游，但今年我得到一个信息，国保对有关人说：第一，你们不要乱说乱动给我们添麻烦；第二，现在平反不可能；第三，当局在考虑这个问题，等时机成熟再说——当然你也可能说，这是为了稳定人心的一套说法，真实性可以存疑，但也未必就是空穴来风。





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学生。摄：Chris Niedenthal/The LIFE Images Collection/Getty Images

“在商言商”：从四通到华为

端：在四通时代落幕之后，中国的民营企业有很明显的“闷声发大财”特征，一些商界领袖的言论，比如“在商言商”，也引起很大争议，你如何看待民营企业在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中的角色？

万：说这话的人太“虚伪”了（笑）当时我在四通，一开始还规定大家不能上街，说我们是做企业的，有角色分工云云，当时有一部分四通员工很不满意，给我写公开信，说别的公司老总已经带着员工上街了，头上绑着标语，走在公司队伍的最前头。而这位老总，就是今天说“在商言商”、说1989年“老万脑袋发热”的人，我说这家伙当初脑袋比我还热啊，当时“在商言商”的可是我啊。

话说回来，在中国这种专制体制下，“在商言商”是不可能的。每一代巨富的崛起都不例外，也就是所谓“红顶商人”，胡雪岩靠的是左宗棠，盛宣怀靠的是李鸿章。到了1980年代，康华公司靠的是邓家，就连四通，因为受过赵紫阳的表扬，都被人说成是“姓赵”，更离谱的是有人说我是万里的儿子。

在中国这种专制体制下，“在商言商”是不可能的。每一代巨富的崛起都不例外，也就是所谓“红顶商人”。

端：但在当下环境中，“在商言商”又如何解读？任正非一直说华为是一家正常的公司，没有政府背景，只凭技术力量挣钱，这也是“在商言商”的变形说法，但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国内，一直都有怀疑声音。

万：华为目前遇到的问题，与其说是美国对他的围堵，不如说是因为在中国这种环境下——我可以很明确地说——他不可能不和安全部门合作。尤其是在2017年6月《国家情报法》通过之后更是如此。华为作为领军通信企业，中共不可能不对它有所企图，虽然任正非虽然在公开讲话中不断否认这一点。

如果说这还只是一种推测的话，我还可以透露一个信息：当年四通已经被安全部门找过。我记得很清楚，平时都是我们请（海淀）区政府的人吃饭，但那一次是区政府的人请我们吃饭，实际上背后是安全部门的人让区政府出面来找我们，说得也很明确：安全部门要往四通公司派人，你们要配合。理由是：因为四通公司有许多“涉外业务”，所以要帮忙“把好关”，让你们“少犯错误”。至于像今天的华为，在全世界布局，这是情报工作非常好的机会，他们不可能放弃。

当年四通已经被安全部门找过，说得也很明确：安全部门要往四通公司派人，你们要配合。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门阀政治”也决定了，没有哪个行业能独立于权力之外来发展。电信、石油、电力等行业、以及后来的海航和安邦，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在这种环境中，有可能“在商言商”吗？

端：虽然全世界都在怀疑华为，但目前的事实的确是，迄今没有发现关于“后门”的过硬证据，能证明华为在和安全及情报部门合作。

万：它不需要在产品里安装一个“后门”，所有的通讯数据需要备份，已经有案例显示华为设备会自动上传数据，这从技术上也可以解释，因为出于数据安全考虑，必须异地保存备份，而且重要数据（比如银行）的备份可能还不止一份，这都是正常业务，但是当数据被保存下来之后怎么使用，这就是安全部门的事了。美国也在做同样的事，比如声称出于反恐需要，要了解恐怖分子的资金往来，要求公司提供数据，你能不提供吗？

端：除了技术问题，这次华为面对危机，任正非已经多次出面表态，外界反响普遍不错，认为有格局、有眼光。你又如何评价？

万：任正非的悲剧也正在于此。首先，他能够把华为做到这么大，这不是偶然的。他对美国的态度、对开放经济、对自主创新的想法，是很实事求是的，这些话的确是“在商言商”，脑子也很清楚。

但问题在于，他在中国这个环境中，好比你有一对霸道的父母，你自己表现得再谦卑、再理性，是没有用的，因为人家是把你当作国与国之间竞争的一个牺牲品。所以华为的悲剧在于，你自己再明白，如果这个国家不明白，无济于事。

华为的悲剧在于，你自己再明白，如果这个国家不明白，无济于事。

再往大里说，华为所赖以生长的这个体制，是“百代都行秦政法”，以前是“儒表法里”，现在是“马（马克思主义）表法里”，再加上现代技术手段，使得控制更加广泛有效，达到生活的所有细节。我原来认为，技术手段的发展有助于促进民主，但后来发现实际上可能恰好相反。美国现在有点明白了，如果你用这种制度、加上这种技术手段来竞争，那就要从根本上“断开”，这就是为什么华为、海康威视这种公司成为打击目标，虽然现有的技术你还可以用，但下一步继续发展将会非常困难。





面对海外民运艰难的三十年，却始终没有被“屠宰”掉，正显示其韧性之强。“至少我们血还是热的，骨头还是硬的。”万润南说。摄：凯枫/端传媒

血仍未冷，骨头仍硬

端：你当年有一个著名的表态——“血要热、头脑要冷、骨头要硬”。30年后，如何继续践行这几方面？尤其是当热血慢慢冷却之后，如何应对这种挑战？

万：正因为大家的血越来越冷，所以热血更加可贵。我的看法仍然乐观：中国可不能自外于世界潮流，人有一张嘴，要吃饭，要说话，要有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要有言论自由，这是普世性的，中国人也不例外。当然，在长久的专制政治、物质匮乏和人口密度下，相比西方的确有不同的环境，但这是程度问题，不是本质问题。

说到六四之后的海外流亡运动，我们当年有一个期望——旗帜不倒、队伍不散。如今来看，起码旗帜没有倒，还竖了很多面；队伍起码还有人能从世界各地聚来开会。一个流亡运动，能够坚持30年，旗帜还在，人还在，血还是热的、头脑还是冷的、骨头还是硬的，我认为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端：但也不能不承认，海外民运的声音已经非常边缘化了，在媒体上也很难发出有力度的声音。

万：我有个台湾朋友曾经戏称，媒体行业是制造业、修理业、屠宰业。什么意思呢？媒体先制造出一个新闻和新闻人物，然后不断地“修理”他，每修理一次都是一个新闻，先是正面，然后是不断的负面，最后“屠宰”掉。海外民运这30年来被“修理”得太多了，但还没有被“屠宰”掉，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坚强吗？抗战不过才八年，我们已经坚持了快四个抗战了。

海外民运这30年来被“修理”得太多了，但还没有被“屠宰”掉，这不正说明我们的坚强吗？

中国未来一定会变的，至于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不重要。有一句话我说过很多次，在六四30年之际还是愿意再重申一次：在这场变化中，我们是压力、是温度、是催化剂，最后的生成物里有没有我们，不重要了，这就叫“功成不必在我”。

最后我想再强调的一点是，海外民运这30年逐渐走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美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中共抱有幻想，而现在面临着一个大格局的变化，应该说，一个新的局面开始了，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前中国的专制政体一直压制着大陆、香港和台湾，现在美国醒悟到，必须要对这种强权针锋相对，某种意义上说，民主的机会更大了。

四通

六四

万润南

六四30年



热门头条

1. 华为总裁任正非就美国禁令答记者问
2. 何边书：中美科技战，时代不站在华为和任正非一边
3. 关键合作方“断供”，华为真的准备好了么？
4. 边缘化的六四论述：八九春夏，其实发生的是“两场运动”
5. “我当时，可能真是做对了一件事”——那个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湾记者们(上)
6.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7. 华尔街日报：华为崛起之路伴随着剽窃与不正当竞争指控
8. 半生被称刽子手，戒严部队军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9. 被围困的六四论述，需与后冷战的时代光谱重新对接
10. 影像：台湾同婚合法日，超过500对同志伴侣登记成婚

编辑推荐

1. “妈妈你说今天晚上会开枪吗？”——天安门母亲寻觅三十年
2. “北京公社”的八个瞬间（下）：以“无政府主义”视角重构六四
3. 专访四通总裁万润南：三十年来血仍未冷，格局变化将带来新局面
4. 专访王超华：我不是秋瑾，我是你们的一分子
5. 请回答1989：支援与裂缝，那一年，香港学生在北京
6. 专访裴敏欣：中国或通过改良式革命转型，挑战将来自中共内部
7. 從北京警察到六四抗暴者：他牽着兩歲女兒，目睹世界翻轉
8. “寻衅滋事”式纪念，陈云飞“快乐抗争”的心法

9. 六四报导在香港：抵抗时间流逝、采访管控和中央划线

10. 2019年戛纳影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虚幻的满足感：电影产业还强盛地活着

延伸阅读

半生被称刽子手，戒严部队军官：“我也是六四受害者”

李晓明是六四戒严部队之中一人，离开中国后，长期受失眠、易怒所苦，近年才去看心理医生。枪响30年后，他说：“虽我没开枪、没杀人，但身为当时戒严部队的20万戒严部队的一员，当时我在部队服役，我觉得也是一种耻辱，有一种内疚情感。军人……，在六四中扮演很可耻的角色吧。”

英剧《Chimerica》追寻坦克人：讨论六四？抑或一场美丽的误会？

编剧柯克伍德直指中国是如何买起美国甚至全世界，不知道有没有观众因此如梦初醒……

自认“逃兵”的谢三泰，30年后解封的民运照片——那个春夏之交，在“北平”的台湾记者们(下)

“你知道，在那个信息不对等的社会里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采集影像，如此而已。”

六四报导在香港：抵抗时间流逝、采访管控和中央划线

“有些被访者二十周年时找到他们，廿五周年时已经不能接触到了。”香港传媒人如何年复一年讲述六四？我们采访了《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和《铿锵集》高级监制薛友德。

英国第四台交出的不合格功课：六四成了《Chimerica》的Hashtag？

消费坦克人图像，说中国与西方的社会“无甚分别”；剧中那些中国政治元素，都似乎在堆砌一种“离地”的中国关注……

“寻衅滋事”式纪念，陈云飞“快乐抗争”的心法

“公权力就是猛兽，我们目的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陈云飞就是驯兽师。

六四舞台庄梅岩：我们不能不做，香港人不会习惯那种没自由的生活方式

“直至来到第三十年，才终于觉得是时候要做点事——并不只是因为事情经过长年的沉淀、人生经历多了、心态转变了等，而是因为社会也变了，变得愈来愈扭曲。”

【书摘】《重返天安门》：八九民运的成都现场纪实

成都政府采取了迅速而严厉的报复行动。到了六月十六日，已有106人被捕。六周内就执行了第一场处决……。成都从未出动解放军。但警察与人民武装警察部队联手镇压抗议，使得公众对其的敌意非常强烈，以至于有段

时间一些警察个仕公开场合穿制服。

從北京警察到六四抗暴者：他牽着兩歲女兒，目睹世界翻轉

“我就想我们的任务就是保护学生，支持学生最好的方法就是听他们的。他们不让进我们就不进。大家要团结一致。”